

解
送
天
鑑
集

新文學選集

郁達夫選集

開明書店

郁遠夫選集

每冊售價人民幣16,000元

己(琰8774)

著者	郁遠夫
編輯者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茅盾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66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51年7月初版(1—5000)

146P 27K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個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邏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為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輯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序

丁 易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郁達夫先生被日本法西斯憲兵殺害於蘇門答臘，到今天已經整整五年了。這五年之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及人民的英明領袖毛澤東主席領導之下，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空前巨業，除了臺灣西藏而外，全國已經全部解放，並且開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中國人民已經莊嚴地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了。達夫先生如果還活着，憑着他那摯愛祖國的熱情，眼看到今天祖國以英勇的姿態大踏步的向富強的道路上邁進，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改善起來，他一定會像今天許多文藝工作者一樣，毫不吝惜的來改造自己，跟自己進行強烈的自我鬥爭，把自己變得更堅強更結實，無條件的獻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但是令人悲痛的是他已經死了，這是不能不感到遺憾的。

二

達夫先生一生貫串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對日抗戰幾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每一階段對他的思想都或多或少的起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五四」，對於他的思想簡直具有決定的意義。

「五四」的基本精神是反帝反封建，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跟幾千年的封建思想，禮教以及傳統的儒家學說作頑強的鬥爭，同時也興起了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爲主要內容的愛國主義。達夫先生這一時期的作品雖然是屬於浪漫主義的感傷頹廢，但卻也帶有一戰鬥精神。

浪漫主義的感傷頹廢是達夫先生作品中的一個主調，這主調一直到他後幾年的小說中還是濃厚的存在着。但就他的初期作品來說，這感傷頹廢與其說是個人的牢愁悲痛，毋寧說是對當時醜惡現實的反抗。因爲他個人的牢愁悲痛，是根源於這醜惡的現實的。他在作品中赤裸裸的要求人生的物質生活，大膽的描寫生理上的性慾苦悶，盡情的傾吐自己對現實社會的悲憤，甚至於在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中勸文學青年們去做賊，這些，對當時反動的軍閥官僚政治，以及在社會上還有相當勢力的虛偽的封建道德和吃人的舊禮教，都是一個刻骨的諷刺，沈重的打擊。誠如郭沫若先生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發狂了。爲什麼，就因爲有這樣露骨的眞率，使他們感受到作假的

困難。①沫若先生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後來暨南大學打算聘達夫先生任教授，還爲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教育部長王世杰所批駁，說是他生活浪漫，不足爲人師。②由此也可見這批新官僚假道學是怎樣把他恨入骨髓了。

達夫先生的感傷頹廢的作品是對封建社會的叛逆宣言，但這叛逆卻又不是冰冷無情，相反的，他倒是蘊藏着一股強烈的熱情的。這就是他那顆熱愛祖國的赤心，以及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憤怒，他在他的第一篇創作沈淪的結尾曾這樣呼喊：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祖國的衰弱不振，政治黑暗，軍閥橫行，人民貧苦。帝國主義窮兇極惡的加強侵略，對中國人民橫蠻無理的侮辱欺凌。達夫先生在日本讀書時深深體驗了這些，這是他最大的悲痛所在，後來他在懺餘獨白中曾說及那時的心情：

我的懺餘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權的島國裏過的。眼看到故國的陸沈，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我所想所思，所經所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同初喪了夫主的寡婦一般，毫無氣力，毫無勇氣，哀哀切切，悲鳴出來的，就是那一卷當時很惹起了許多非難的

沈淪。◎

這是他的真情實感，所以那時他一方面感傷頹廢，憤世嫉俗，甚而至於要自殺。另一方面呢，他又呼號吶喊，要祖國快一點富強起來。

但是，可惜得很，達夫先生看出了中國現實社會的黑暗，卻不知道如何消滅這黑暗，希望中國富強，卻不知道怎樣纔可以使中國富強起來，這就使他墮入了更苦悶的境地。不過這苦悶，在「五四」前後的文藝工作者中也是普遍存在的，那時大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都還分歧得很，但卻也各自找出了道路：有的站在進化論立場和舊勢力作鬥爭，有的抓住了人道主義在摸索前進，有的把自己沈溺在愛與美的幻想中，有的卻在狂風暴雨似的精神要來摧毀這世界。不過，達夫先生都沒有走向這些道路，他卻讓自己更走向荊棘叢中，那就是更感傷更頹廢下去。感傷頹廢得簡直有些近乎自我麻醉，自己戕害自己。他寫出了許多自敘傳式的作品，描寫個人的悲苦經歷，描寫性的苦悶，描寫變態的心理，描寫妓女，肉慾，色情……

這些作品在積極方面雖然揭穿了舊禮教的虛偽和尊嚴，但這種精神情緒實在是不健康的，特別是在「五四」狂飆以後，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革命有了正確的領導，社會已向新跨進了一大步，這種消極的自戕式的反抗，對於現實的反動政治無損於秋毫，而在客觀

上對青年們的前進向上的熱忱卻起了一種很不好的消極作用。老實說，達夫先生這些作品在這個時期，不但已經喪失了它的社會意義，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會前進的障礙了。

達夫先生這類小說寫有十幾篇之多，這裏只選了沈淪，采石磯，過去三篇，這三篇都是他的自敘傳式的小說，采石磯表面上雖是篇歷史小說，但其中的黃仲則實際上也就是他自己。

三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共產主義思想領導之下的一個統一戰線的運動，通過這一運動，共產主義文化思想更廣泛的流傳開來，當時知識分子或多或少的都受了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達夫先生便是受這思想影響的一個。他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寫了一篇文學上的階級鬥爭，和郭沫若先生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一文同時發表在創造週報第三期，他在這文中曾大聲疾呼：「世界上受苦的無產階級者，在文學上社會上被壓迫的同志，凡對有權有產階級的走狗對敵的文人，我們大家不可不團結起來！」自然，這只是一些口號，而且是一些模糊不夠明確的口號，但在當時卻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的。由於這點積極因素，所以

在達夫先生初期的作品中，除去抒寫個人傷感的作品而外，也還有以煙廠女工爲題材的春風沈醉的晚上，以人力車夫爲題材的薄奠。

這兩篇小說是多少帶有點社會主義色彩的，達夫先生開始有意的去寫勞動人民，企圖把他們的生活表現出來，事實上他也確把勞動人民的那種真誠淳樸，正直光明的高貴的品質給表現出來了。並且在春風沈醉的晚上借了女工二妹的口說出了對於廠方的切齒仇恨，在薄奠裏的「我」竟對那些汽車中的貴人這樣叫罵起來：「豬狗，畜生！你們看什麼？我的朋友，這可憐的拉車者，是爲你們所逼死的呀！你們還看什麼？」像這些地方都已經正式接觸到人類階級關係的矛盾與鬥爭的方面，然而可惜得很，也就僅止於此而已，作者並沒有更深一層更進一步的發掘下去，終於女工還是照舊要受廠方的剝削，受管理人的侮辱，而人力車夫仍不免於沈水而死。他們究竟應該走什麼道路呢？作者是一點也沒有指出的，這原因就是由於作者終究是站在第三者立場，這兩篇作品中的「我」便是作者自己，這個「我」自始至終只是站在女工和車夫那一階級之外，去同情他們，熱愛他們，卻不是站在他們的階級之中，去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呼吸，共同戰鬥，共求解放。達夫先生是始終沒有放棄他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的。

這一思想上的不徹底，便決定了達夫先生在大革命前後的行動和他的創作內容。

首先，由於他有了這一個進一步的基本認識，他是曾經幾次的想振作起來的。一九二六年，他高興地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不久又回到上海去編輯洪水，都顯得很積極，但這積極卻是沒有深固的基礎的，由於他的思想上的不做底，一遇挫折，便又萎縮下去，這在本集中所選的病閒日記中就可以看出端倪，而一九二七年他在雞肋集題辭中更有一段很好的自白：

我和兩位朋友，東裝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在那裏本想改變舊習，把滿腔熱忱，滿懷悲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誰知鬼蜮弄旌旗，在那裏所見到的，又只是些陰謀詭計，卑鄙污濁。一種幻想，如兒童吹玩的肥皂球兒，不待半年，就被現實惡風吹破了。這中間雖然沒有寫文章，然而對於中國人心的死滅，革命事業的難成，卻又添了一層確信。

革命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這般完美」^①，抱着滿腔浪漫諦克的熱情，投向革命，而不是從實際出發，沒有看清楚革命的基本力量——人民的力量，只看到上層的少數人的活動，那麼一看到有人背叛革命，要陰謀詭計的時候，那就自然會悲觀失望，感到「革命事業難成」了。無庸諱言的，達夫先生這時正對革命是有些動搖了。一九二七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動盪時代，達夫先生這時正在這動盪時代的漩渦中心上海，但他卻沒有捲入這漩渦之中，只在漩渦外邊寫下了日記九

種，主要的事情卻是在搞戀愛，而和他同在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兩位先生卻已投身於實際的革命鬥爭中了。

但是，應該指出的，達夫先生雖然對革命發生動搖，但他對反革命卻仍然是深惡絕痛的，所以他的日記九種雖然沈溺於個人的戀愛糾紛，但他對蔣介石這個出賣革命的反動頭子卻表示了最大的痛恨。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買了一張外國報來讀，蔣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個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吳稚暉等在幫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他這憎恨的感情是真實的，但卻又不是從階級觀點出發，而是從愛國主義出發的，所以他接着就說：「以後我要奮鬥，要為國家而奮鬥，我也不甘再自暴自棄了。」^⑥這以後他在釣臺春畫中還斥國民黨中央為「中央黨帝」，說他們「想玩個秦始皇所玩過的把戲」。這些都是他動搖中的積極因素，這因素使得他在一九三〇年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一九三二年又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他參加這兩個團體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表面上受到挫折的時期，特別在蔣介石統治的上海，特務的屠殺鎮壓造成了極大的白色恐怖，這又發展了達夫先生的動搖的一面，終致使他脫離了左聯，跑到杭州歸隱了。

四

這以後達夫先生的思想是處在一個極其矛盾的錯綜複雜的狀態中，一方面他的感傷頹廢蛻化而爲一種隱遁逃避與世無爭的思想，另一方面他的詩人氣質和愛國主義的熱情，卻又不能使他真正的寧靜下來，而不得不對現實有着憤懣。

一般說來，達夫先生在離開上海以後到抗戰爆發前這一段時期內，前一種思想是占上風的，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他最消沈的時期，曾一度淪落到官僚的幕中，消沈得幾乎近於妥協了。這時他大量地寫下了一些游記小品之類的東西，充分表現出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悠游閒適的情趣，這思想這情趣也同樣的流露在他的這一時期的小說裏面，遲桂花和東梓關便是這一類的代表作品。

在遲桂花裏作者寫了一個在愛情中受了刺激的留學生翁則生，在杭州西湖多年養病之後，竟把一切都看穿了，「覺得在這世上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於是便做了一城市山林的隱士，疏散無爲，隨遇而安，甚至連辦自己的婚姻也都像辦別人的事一樣的那麼無動於中了。在東梓關裏面作者寫了一個名醫徐竹園，那完全是一個封建名士，喝喝釀茶，吸吸鴉片，賣賣藥，行行醫，讀讀古書，玩

玩古董，對這樣一種人，作者卻借了文樸的口給了這樣一個評價：「大約像他老先生那樣舒徐渾厚的人物，現在總也不多了吧？這竹園先生也許是舊時的這種人物的最後一個典型。」無疑的，可以看出作者對於這種人物的「不多」，是有一些惋惜的。然而，作者在這裏卻忽略了一點，極其重要的一點，無論徐竹園是如何的「舒徐渾厚」，但他卻仍要「經營祖上遺產」，而且「每年收入」還「薄有盈餘」，這種不勞而獲的地主剝削農民的行為，作者卻絲毫沒有觸及。同樣的，遲桂花裏的翁則生也是個薄有田產的少爺之類。作者似乎只看他們的悠游閒適的生活，而致以嚮往之忱，但卻忘了這悠游閒適的生活是建築在這樣的血淚的經濟基礎之上。

這兩篇小說的環境都是農村，在這裏作者以前的對勞動人民的熱愛和同情還是一貫存在的，他寫出了鄉村農民的誠樸和忠實，雖然缺點是把他們寫得太閒暇了一點，和一九三〇年以後的中國破碎的農村毫不相稱，但在達夫先生的這兩篇作品中該算是一點進步意識了。

這點進步意識對達夫先生倒是很重要的，這意識使他雖然神往於肥遯林泉，超然物外的隱士生活，但卻不可能沈溺在裏面，他仍然不得不伸出頭來看一看現實，也就不得不對現實吐出憤懣，他在微蕨集序中說：

財聚關中，百姓是官家的魚肉；威加海內，天皇乃明聖的至尊。於是腹誹者誅，偶語者棄市，不腹誹不偶語者也一概格殺勿論，防患於未然也。這麼一來，我輩小民，便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⑧

這種憤懣是對大革命後以蔣介石爲首的新軍閥新官僚的憤懣。就在這種憤懣心情支配之下，達夫先生寫下了以大革命時代爲背景的兩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和本集所選的出奔。

這兩篇小說在達夫先生的創作題材方面是和以前有些不同的。以前的作品絕大部分是寫他自己或是改了裝的自己，這兩篇小說卻不同了，他已經把題材擴張到社會的各方面，企圖來表現一個時代了。

她是一個弱女子是個中篇小說（達夫先生較長的小說只有這一篇和迷羊，此外全是短篇），時代背景主要的是大革命，但卻也上追到「五四」，下說到「一二八」，其中有新舊軍閥的橫行，有一九二七年三月中上海工人羣衆的革命行動，有淞滬抗戰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同胞的屠殺。人物也很廣泛，主要的有虛榮軟弱的鄭秀岳，有變態性慾的李文卿，也有性格堅強爲革命事業奮鬥不屈的投身工人行列的馮世芬。而作者在這裏無疑地對鄭秀岳和李文卿是否定的，而對馮世芬是肯定的。但由於作者對革命行動經驗的缺乏，理解也就不能深入，於是對革命行動場面的描繪和對革命人物的塑造也就顯得有些浮泛平面，倒反

是他過去作品中的主調——肉慾和色情的描寫占了上風了。但是不管怎樣，這篇小說在達夫先生作品中仍不失爲具有進步意義的作品。因爲篇幅太長，且色情描繪過多，所以沒有選入，但也附在這裏說一下。

出奔是一九三五年寫的，在我所見到的達夫先生小說中這該是最後的一篇了，然而就在這一篇中，卻顯出了他的思想更向前一步的躍進。在這篇小說裏，作者十分細緻地刻畫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的剝削行爲，也描繪出地主階級本身的貪鄙自私刻薄殘忍的性格，並且分析了地主在革命過程中怎樣鑽空子混進革命陣營來破壞革命，前後一貫地流露出作者對地主階級仇視憎惡的心情，所以也顯得很有振撼人的力量，在達夫先生小說中實是一篇很難得的作品。雖然在結尾由錢時英一把火把那地主一家大小燒死完事，有點近乎幼稚的報復，但也可以由此窺見作者對地主階級的憎恨是到了如何的程度。

自然，如果要說作者在這篇小說裏已經看到了人民的力量，那還是沒有的。達夫先生一直到他犧牲時止，對這點始終沒有明確的認識，這就決定了他始終不能堅決的背叛自己階級走向革命道路。

抗戰爆發以後，達夫先生似乎沒有寫下什麼創作，但他對抗戰是積極的，他應郭沫若先生之約，參加了當時的政治部工作，到過台兒莊和其他前線勞軍^①。和當時許多文藝工